

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
中华书局编辑部

编

复旦文史讲堂之四

# 思接千载

为什么“Mr.Science”中文叫“科学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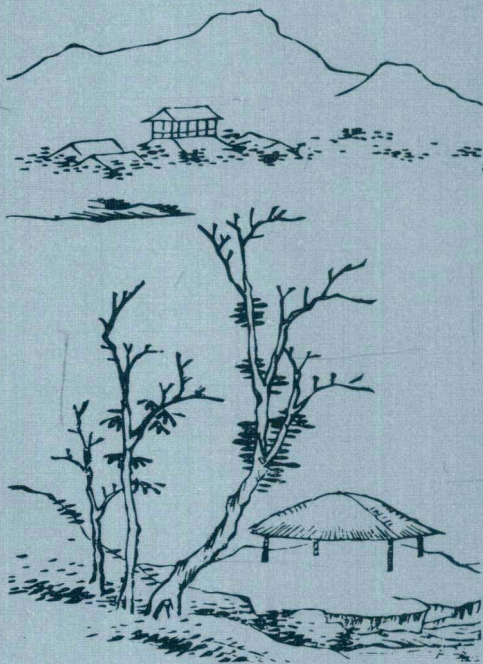
正风俗与反禁奢：明清崇奢论的社会史与思想史

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

汉文化整体研究：回顾与前瞻

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

再说《李娃传》两题



中华书局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# 恩接千载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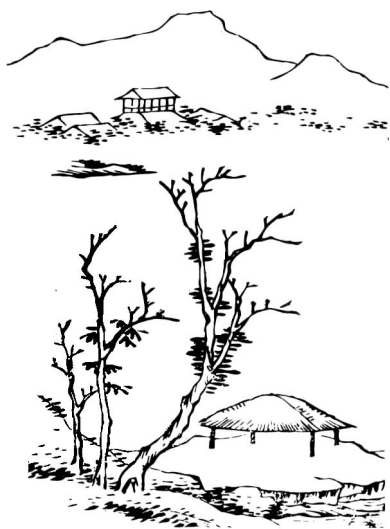


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
中华书局编辑部

编

复旦文史讲堂之四

# 思接千载



中华书局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思接千载 /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, 中华书局编辑部  
编. —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10

(复旦文史讲堂; 4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137 - 4

I. 思… II. ①复…②中… III. 社会科学 — 文集  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0056 号

- 
- 书 名** 思接千载  
**编 者**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
中华书局编辑部  
**丛 书 名** 复旦文史讲堂(第四辑)  
**责任编辑** 王 芳  
**出版发行**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 
**印 刷**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
**版 次**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**规 格** 开本 700×960 毫米 1/16  
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 
**印 数** 1-2000 册  
**国际书号** ISBN 978 - 7 - 101 - 08137 - 4  
**定 价** 43.00 元
-

# 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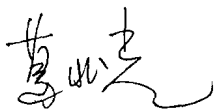
汇集在这一辑里的，是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整整一年间，在“复旦文史讲堂”进行的十一场讲座的记录稿。看上去主题相当分散，有文学史，从两汉文学到唐代小说；有社会史，从宋代妇女守节到明代的崇奢论；也有学术史，从美国的朱熹研究到陈寅恪的治学；还有文化交流与比较，从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士的意义，转道日本的科学概念和中国的格致旧词，到求异还是趋同的比较方法，虽然是“出文入史”，所涉及的话题却相当广泛。不过，我读过校样之后，总觉得这些演讲仍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就是这些造诣精深的学者，以他们各自的阅读经验，通过各种主题的演讲，在向年轻的学生呈现学术视野，强调专业精神，示范研究方法。

本来大学就应该讲“学术视野”、“专业精神”和“研究方法”。可惜的是，近年来这种学院的要求似乎从大学中淡化了，那种随意的、趣味的和漂浮的风气渐渐在课堂以及讲座中弥漫，“学院本当传绝业”，如今却变成“世态万端都成戏”。我一直觉得，如果仅仅是凭着兴趣和感悟，把历史、文学和哲学当作“消遣”，写一些感性的小说、灵动的杂文和聪明的随感，甚至编一些“写给大众的某某史”，说一些“某朝那些事儿”，其实，不一定非到大学来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，那些严格到刻板的学术训练，反而会阻碍这些机智和

感动。不过,我以为,若是想做出一些前人不曾做过的业绩,发现一些前人不曾发现的历史,并在学术世界与国际学界较长论短,却不能不在国际学术的平台上接受检验,在严格规范的镣铐中跳舞,在“冷板凳”和“故纸堆”里沉下心来翻检。英文里“大学”(University)和“教授”(Professor)两个词也许说明,大学既要传授普遍知识,教授也要教专业知识,所以,大学的严格训练是必要的,而大学的学术讲座,就不得不多讲所谓“视野”、“精神”和“方法”,尽可能呈现教授们知识世界的宽阔、研究纪律的严格和学术论述的清晰。

这一年里,接受我们的邀请,在“复旦文史讲堂”演讲的教授,有来自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的朋友,也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。在“复旦文史讲堂”演讲的讲题,有关于历史上的思想与社会风气的,有讨论东西文化接触后的观念与知识变迁的,有讨论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的,也有讨论文学史中的问题的,所谈的话题,上起汉唐下至民国,时间横跨了两个千年。但是,无论他们来自何处,无论他们讲什么话题,由于他们身处这一共同的学术世界,需要在一个学术规则中呈现自己的研究所得,所以,当他们“思接千载”,也就是面对种种历史文献和历史现象的时候,并不可能只靠“精骛八极”,凭天才的想象信口开河,真正的、现代的、大学的学术研究,需要有宽广的“学术视野”、严格的“专业精神”和科学的“研究方法”。这一点,各位读者尽可以在这些教授的演讲记录和现场问答中,清楚而充分地看到。

其实这是常识,本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。



2010年10月26日于上海

# 目 录

(1)

**为什么“Mr. Science”中文叫“科学”？**

主讲人：艾尔曼 (Benjamin A. Elman)

主持人：章清

(29)

**程朱理学与妇女守节之再讨论**

主讲人：柏文莉 (Beverly Bossler)

主持人：司徒

(55)

**正风俗与反禁奢：明清崇奢论的社会史与思想史**

主讲人：林丽月

主持人：邹振环

(77)

**两汉时期的思想与文学**

主讲人：釜谷武志

主持人：杨明

(103)

**朱熹研究在美国：以陈荣捷、余英时与田浩的研究为中心**

主讲人：田浩(Hoyt Tillman)

主持人：吴震

(125)

**“了解之同情”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**

主讲人：桑兵

主持人：章清

(153)

**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**

主讲人：罗志田

主持人：葛兆光

(187)

**汉文化整体研究：回顾与前瞻**

主讲人：陈庆浩

主持人：陈尚君

(203)

**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**

主讲人：夏伯嘉(Ronnie Po-chia Hsia)

主持人：周振鹤



(221)

**再说《李娃传》两题**

主讲人：倪豪士(William H. Nienhauser)

主持人：陈引驰

(241)

**求异还是趋同：谈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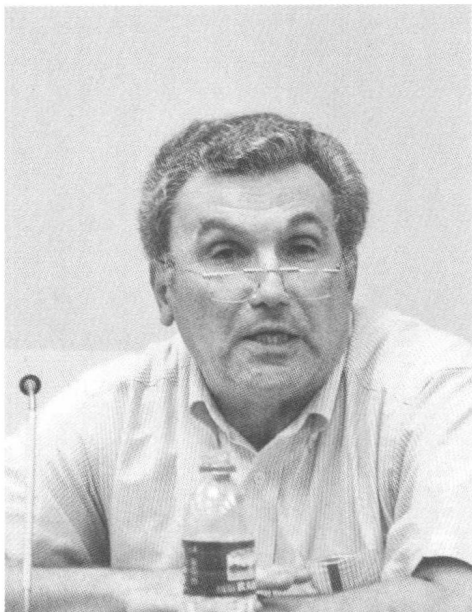
主讲人：张隆溪

主持人：葛兆光

# 为什么“Mr. Science”中文叫 “科学”？

主讲人：艾尔曼 (Benjamin A. Elman)

主持人：章清



艾尔曼 (Benjamin A. Elman)

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,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,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主任(2005—2010)与东亚学系主任(2010—2015), 兼任复旦大学长江讲座教授。主要从事近世以来中国思想、文化、科学、社会史和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。著作有《从理学到朴学: 晚期中华帝国知识与社会变革》(*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: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*)、《经学、政治和宗族: 中华帝国后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》(*Classicism, Politics, and Kinship: the Ch'ang-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*)、《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》(*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*)、《中国科学面面观, 1550—1900》(*On Their Own Terms: Science in China, 1550—1900*)、《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》(*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*)。

章清

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教授,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。

### 章清：

今天，复旦文史讲堂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来做讲演，作为复旦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艾尔曼教授与复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。在未来三年里，他每年都会到学校来，不单是发表演讲，还会为学生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。关于艾尔曼教授的研究，中文界大概最早注意到的是他的《从理学到朴学》这本书。近些年，他也先后出版了好几本很厚重的书，包括《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》、《中国科学面面观，1550—1900》，这两本书的厚度都相当可观，书籍的中文翻译也都在进行之中，相信很快会和读者见面。今天，艾尔曼教授报告的题目是：为什么“赛先生”中文叫“科学”？我想，“赛先生”是我们太熟悉的一个称谓，这是流行于五四时期的一个口号。那么，在把“赛先生”称为“科学”这样一个过程里面，又发生了什么呢？下面请艾尔曼教授为我们做出他的诠释。（掌声）

### 艾尔曼：

谢谢章清教授。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，尤其是未来的三年都有机会同你们一起讨论、交换意见，这对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谢谢大家！

我在研究明清科学史的过程中，注意到“科学”这个词有它的主体内容。

我们过去都把它当作是客观的——科学就是科学，science 就是 science。但实际问题比较复杂，“科学”这个词并不是由中国人发明的，而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发明的。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学，翻译成汉字，是为“科学”。后来，很多人觉得中国以往没有什么科学，科学是在 20 世纪以后出现的。所以，我今天要谈的是，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？“科学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是“科学”这个日本人翻译的汉字词汇？

大家都知道，陈独秀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，提倡中国一方面需要打倒儒家，打倒传统艺术和宗教，一方面要接受新文化。新文化的重要内容，一个是“赛先生 (science)”，即科学，另一个就是“德先生 (democracy)”，即民主。陈独秀先生那时是北京大学文学部的部长，他的主张发表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面。他把科学和民主称为“赛先生”与“德先生”，提出只有提倡民主、科学——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——才可以救中国。那时，科学与救国的关系很紧密。他用了日本的“科学”一词，却没有说明词汇的来源。这些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新主张，不只在五四运动期间影响我们，也在五四运动时影响我们。那么我今天就试图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，五四运动以前，看情况是怎么样的？中国人为什么在翻译“赛先生”时，用了“科学”这两个字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、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。

1922 年，冯友兰先生到美国休假一年，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课。那时他跟杜威先生曾做过一些哲学方面的交流。他写了一篇名为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？》的文章，很出名。他认为西方有科学，中国没有；而中国之所以落后，就是因为中国没有“科学”。19 世纪末的英国人傅兰雅 (John Fryer) 到上海后，在格致书院有一些活动，还在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籍。那期间，很多东西被翻成中文，尤其是与科学相关的东西，但那时没有用“科学”这两个字，而是用“格致学”。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除了“科学”之外，“赛先生”有别的名字吗？答案是：中国在有“赛先生”之前是有科学的，那就是格物致知之学，或格致学。但 20 世纪的人们似乎把以前那个词丢掉了。傅兰雅见证了在中国使用“格致学”的最后一刻。他在上海工作、生活了三十余年，当中国

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，傅兰雅就感到中国没有前途了。他看到日本是东亚新兴的领袖，中国则是一个衰亡的，落后的，丧失了权力的帝国。所以他那时提出，中国的语言无论在科学还是文学方面将会使用英文；中文将没有地位。这个看法当然不对。但是，从傅兰雅这里，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末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是怎么看清朝的，它衰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，到了需要新文化和革命才能拯救国家的地步。一百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当然知道中文没有被丢掉，但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“世界的普通话”是英文，不是中文。所以，上面的两个例子（一个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从来没有科学，这是它衰落的原因；另一个是英国人傅兰雅，他后来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建立了东方学系，觉得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已经穷途末路了，中国只有学习外国才可以参与全球对话）暗示了，中国没有科学。我以前也轻信了这一点。

之所以说中国没有科学，是因为中国的宗教里面既没有“上帝”，也没有“自然”的概念。中国人不了解宇宙形成、终结的过程，而那是西方自然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。在哲学方面，中国既没有自然法则，也没有逻辑方法来确定知识，换言之，理论和知识没有放到一起。虽然中国有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一些问题作出解释，比如宇宙论、阴阳五行学这类的东西，但它们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认客观事实存在的原因。因此，它不成其为客观知识。即使是中国古代发明的数学方法，也以命理为目的，不是用来测量的。中国语言充斥着成语、古文、诗和八股文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语言。中国的科举制没有益处，就像小脚损害女人的身体，八股文损害男人的脑子。儒家思想一无是处，它以道德说教为主，排斥新知识，是非理性的方法论。中国的专制政府压制新思潮、新思想。经济方面，中国人不了解贸易。按照以前的说法，甚至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商人。韦伯(Max Weber)进了一步，他承认中国有很多商人，但他认为他们不懂得投资。发财之后不懂得投资，就是缺乏资本主义理想。而在经济以外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，不需要机械化，于是，劳动力多成了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先天缺陷。

除了这四方面的原因，还有很多你们熟知的原因。但如果承认这四点

的话,也就意味着承认教育、儒家思想、专制政府和经济方面的种种限制,也就是承认,中国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,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来看傅兰雅和冯友兰先生当初的看法,知道那过于偏激,但我们是站在当下看历史,是有了后见之明。我们以前偏重分析“中国为什么没有什么资本主义、民主、科学?”但是现在,我们是要找到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原因。19世纪的中国人不会同意自己的国家没有自然学,但20世纪的冯友兰、陈独秀和胡适先生都那么认为。中国思想史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?这要从格致学到科学的转变来看。我想,不只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什么,还要问中国为什么有其所有?为什么对自然学感兴趣?中医为什么能发展?此外,在工艺,比如制瓷方面,中国有长足的发展。17、18世纪的老方法,民国时照样在用。还有,鸦片战争之前,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呈顺差,欧洲人、外国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较多,白银大量流入中国。我们要了解18世纪之前的中国在亚洲的位置如何。我去年12月曾在这儿讲“日本是不是第二个罗马?”我说,日本18世纪时还在羡慕中国,学汉语的人很多,学中医的也很多。而到了19世纪末,情况就大不相同了:日本“上台”,清朝则“下台”了。我们以前的看法是,中日的情形从德川时代起一直是那样。但其实不然,这个转变是从19世纪开始的。看19世纪末年发生的事情,足以使我们了解思想界是如何转变的。

在旧中国,人们只说自然学的问题,不提科学。其实西方人在18世纪以前也没有科学,甚至 science 这个词也没有。以前用拉丁文的 scientia, science 是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,逐渐取代了 scientia。scientia 综合了自然学、社会学、人文学和道德学的观念。在中国,与其相对应的是“格致学”。“格致学”来自《大学》,从“格物致知之学”而来。尤其是宋朝的道学派,程颐、程颢、朱子和他的后学们,用“格物致知之学”来分析人生与事态万物。这些知识以道德为主,但朱子也说了,很多知识是在道德以外;每样事物自有其“理”之所在。所以,那时很多中国人开始用“格致”或“格物致知之学”来分析事物。1347年,朱震亨、朱丹溪等有名的南宋、元朝的中医们,把与中

医有关的著作定名为《格致余论》。他们把中医放在格致学里面，从而将中医的学问理学化，也可以说是“新儒学化”。那时，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都受到理学的影响，被理学化了。所以，这个理学化，是把中医的东西和理学、格致学放在一起。《格古要论》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出现的，用了《格古要论》这个名字，该书分析了事物的内容、道理。到了明万历时，胡文焕编《格致丛书》，是格物致知的一个丛书，把以前很多与自然学、语言学、道教、《周易》有关系的内容统统收录了进去。该书有很多版本，甚至一些散落到了韩国和日本。《格致丛书》这个名字说明，它是在西方耶稣传教士来中国之前出版的，也说明我们的综合知识与格致学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张华的《博物志》、宋朝的《续博物志》都收在《格致丛书》里面，都是与自然学相关的。所以，耶稣传教士来中国以前，中国人是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来描述与自然学相关的知识内容的。一方面，“格物致知”与程、朱思想有关；另一方面，它也与中医有关，与博物学、丛书、一般的综合知识有关。

到了万历时，耶稣传教士(如利玛窦)来到中国，他们在翻译拉丁文书籍时，自然而然地将自然学方面的内容冠之以“格致之学”的名号。比如，1626年的《空际格致》，是一本有关西洋天文学的书籍，由亚里士多德(Aristotle)的《自然学》而来。尽管耶稣传教士十分聪明，但他们的中文并没有好到足以自己想出这个名称的地步。“格致”的称谓是那些信教的中国人想出来的。格物致知之学，与西方所谓的自然学相关。《空际格致》最先把西方的自然学翻成中文，采用了“格致”一词。而第二个例子是矿业方面的《坤輿格致》(*De re metallica*)，作者是德国的矿物学家阿格里科拉(Gtorgius Agricola)。汤若望在中国人的帮助下，把它称作“坤輿格致”，就是矿业上格物致知的一本书，它实际是地质学方面的书籍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明朝末年的格致学与西方的自然学有很多重叠的地方。

熊明遇和这些耶稣传教士的关系很密切，他的著作《格致草》里搜录了很多西洋自然学方面的知识。《格致草》里说，中国有其格致，西方亦有其格致，该书编纂的目的是在把它们并置一处，方便人们阅览。中国好的地方要



继承,西方好的地方也要学习采纳,总之,要把最好的知识放在格物致知之学的范畴以内。到了康熙时代,格致学在社会中已经很普遍了,中国人甚至把18世纪初的法国科学院称作“格物穷理院”。这一翻译极富时代性,生动地表达了康熙时代的科学——scientia和法国科学院——格物穷理院。当然,这些翻译在19、20世纪都消失了。但是康熙朝廷的学者,如梅文鼎等人,仍把法国科学院视作与格致有关系的机构。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,陈元龙又编了《格致镜源》,也是一部丛书,这是耶稣传教士到中国以后,中国人再次将所有知识融会贯通的举措。但陈元龙对西学不太感兴趣,所以他的丛书更多地涵盖中国的传统内容。但他用了格致、格物致知之学来进行分类的工作。

中国人“下西洋”的时刻在中国海洋交通史上大概算是顶峰了。但是我觉得,这个位置未免放得有点高了。中国海军最巅峰的时刻应是万历年代。明末,日本人丰臣秀吉崛起,他打败了日本国内的对手,实力一度高涨,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。在我看来,这是中、日海军的第一次较量。中国在这次交战中胜利了,然而,这段历史被我们遗忘了。五四运动以后,没人提起明朝末年中国曾在朝鲜打败了日本。而同时期,西班牙的舰队要侵略英国,西班牙的舰队一共有130艘战舰,20000多名水手。中国跟朝鲜加起来,计500多艘战舰,15000多名水手。可见,这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,日本人那时不愿意承认他们被打败了,借口说是领袖丰臣秀吉死掉了,他们才退回的。其实不然,他们那时候确实被打败了,海军和陆军方面都受到了挫折才撤退的。所以,中国在18世纪、19世纪的时候并不落后,日本也不先进。这显然与我们从19世纪甲午海战以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。

此外,中国的手工业原来也比日本发达。16世纪,日本印书不多,仅一些禅寺可以进行少量印刷,大量的儒学书籍依靠手工抄写。日本人在离开朝鲜时,抓了一批朝鲜的刻工来日本,正是依靠了朝鲜的工人,日本的印刷业才在16世纪、17世纪以后有所发展。在制瓷方面,朝鲜和明代中国都非常有名,日本则相对落后。他们的工艺仍停留在低温烧制粗陶器(stone-